**time/时间(Shí Jiān)**

|  |  |  |
| --- | --- | --- |
| European Perspective | François Hartog | 16 Feb 2022 |

西方的时间

尽管时间是世界上最难以表述的东西，但人类群体，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无论他们是谁，从未停止过试图找到理解它的方法，甚至是去驯化它。圣奥古斯丁（354-430）的沉思，时常被引用，一直极富名望，以至于最后取代了对时间的深思，即是说，如果我们省去他的说法：“时间到底是什么？”“谁将会知道如何轻松而简洁地作出阐释？谁能用语言来表述它，甚至用思想来抓获它？而又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借助言谈唤起的，而且相比时间，更为熟悉、更为了解的呢？[...]时间是什么？如果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知道；如果有人问这个问题，而我想做出解释，那我就不知道了”。如何更简明地说出时间的构成性困境？字面意义上的困境（Aporia）：没有路径可以通向它。试图把握它的一个十分常见的方法，是把一个易朽的时间，即凡人的时间，与一个不老的时间，甚至是永恒的时间，即超常的、不朽的、神圣存在的时间相对立。宗教、神话和宇宙论，都是建立在这一裂隙之上的。

故此，在希腊，那里的神话将柯洛诺斯（Chronos）描绘成原始神，将其置于宇宙的起源。在俄耳浦斯教神统谱系学（Orphic theogonies）中就是如此。如此被神圣化的时间是“不老”的时间，是不腐的、不朽的。作为统一性和永久性的原则，它以根本否定人类时间而呈现，因为与之相反，人类的时间总是不稳定的：它会被抹除，招致遗忘并引向死亡。对于公元前 6 世纪米利都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而言，柯洛诺斯没有被神化，但有一个与正义相关的 "时间之秩序"。他写道，"现有的事物"，从一代人到毁灭，"根据需要"，"正义地互动，并按照时间之秩序，修复他们之中的不公"。时间不等同于正义，但它即便不是代理人，至少也是使正义得以呈现自身的东西，使不公正的一切可能得到修复。在这里，我们可以掌握负责审判的，循环式时间的第一处肇端。时间和正义之间的这种假定关系，将有助于在诸世纪之后，令历史成为一个世界法庭的概念成为可能。即使在阿那克西曼德和黑格尔之间，存在着一整个基督教的时间装置，它以大审判而告终。

此外，在古希腊，柯洛诺斯仍然是一个困惑的场域，或揭示误解的场合。这里的一方面是柯洛诺斯（Chronos），也即时间，其词源不明；另一方面是克洛诺斯（Kronos），是神话中的一个人物。克罗诺斯（Kronos）是乌拉诺斯（Ouranos）和盖亚（Gaia）的儿子，因阉割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在他母亲的明确要求下）而闻名。因此在揽下大权后，他与瑞亚（Rhea）结婚，并从那时起就非常注意地在孩子出生时便将他们吞噬，以避免反过来被其中一个孩子赶下王位。我们知道故事的剩余部分。宙斯最终让他经历了他为自己父亲所预订的，同样的命运，进而成为众神与人类的主人。而我们处于至高权力神话的名册之中，这些神话与时间无关，或者仅仅是消极的，因为吞噬自己的孩子，是打断时间的最好方式。不过，克洛诺斯和柯洛诺斯之间出现了污染，柯洛诺斯，通常意义上的时间，将被持久地视为吞噬或收割的人，他的面貌或是吞噬自己孩子的萨图尔（Saturn），或是手持大镰刀的时间老人。

古希腊人做了另一个有重大结果的划分，因为它更倾向于行动。事实上，他们把时间分为柯洛诺斯（Chronos）和时机（Kairos）：第一个是普通的时间，即季节意义的时间，即行进和被测量的时间；第二个是意料之外的时间，即要抓住的机会，即有利的时刻和决定性的瞬间。知道如何明智地动用“柯洛诺斯”/“时机”这对组合，是行动成功的保证。在时机和柯洛诺斯之间，有一个区别，不是本体意义上的，而是性质上的。用一个常见的形象来说，时机是一个机会之窗的开启，可能仅仅持续一瞬间，而且并非人人都能察觉。否则，拿破仑就不会赢下奥斯特利茨战役！在这第一对组合中，希腊人又增加了第二对，范围更有限，即由时机和危机（Krisis）组成的组合，希波克拉底医学（Hippocratic medicine）尤为诉诸于此。在第一种意义上，危机意味着判断。将危机的概念应用于一种疾病，它意味着指向进程改变的时刻，正向更好或更坏的方向倾斜。这取决于医生是否知晓如何去确定 "关键的那天"，同时也是他进行干预的合适时机。时机和危机之间，存在着语义上的接近。

而今，这三个概念从希腊世界传到了《圣经》世界，即在《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的那天。正如我们所知，《圣经》是三个天启宗教的母体，即三个“圣书的宗教”，也被称为“亚伯拉罕诸教”。很明显，如若没有犹太人的先知和启示录，亦不会有新约或基督教时代。若是没有所有的这些经书，如果没有生活在 7 世纪阿拉伯地区的，不同的犹太教、基督教和多神教社区，也不会有伊斯兰时代和可兰经。

为了令基督教的时间独树一帜，《新约》的作者们出于自己的目的，占用了这三个概念。如果不对它们进行修改，就做不到这点。如果柯洛诺斯仍然是普通的时间，那么危机则被赋予了更强烈的含义，它以大审判或主的日子赋名，也被称为时机。在犹太人的启示录中，将义人与非义人永远分离的审判，是在启示录的暴力之日前进行的。第一批基督徒，一个小的犹太启示录教派，接受了这一体系（念头），同时对其进行了极大地改造，因为弥赛亚（已经）到来。柯洛诺斯没有改变，危机亦没有改变——最后的序列的确是启示录、审判和时间之终焉——但时机成为了中心概念。事实上，时机指的是道成肉身的那一刻。基督是小写的时机（kairos），甚至是时机（Kairos）本身。他是独特的事件，切入了柯洛诺斯意义上的时间，一个彻彻底底的新时间。时间变得以基督为中心，而且愈加增多，直到令基督成为世界时间的支点。这种行动的结果是，如今的柯洛诺斯，被挤压在道成肉身和即将到来的审判这两个界限之间。在两者之间，仅存留着一个没有真实历史的当下。因为如果一切尚未完成，那么一切都已经完成。改过自新保持清醒是必要的，要为迫近的终焉时刻做好准备。有了对这三个概念的新的梳理，一个基督教的历史性制度就形成了，可以被定义为启示录的现在论。道成肉身开启了终焉之时，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说法，就是世界的老年时日，等待着时间和这一世界的结束。但这一令人恐惧而渴求的终焉，只有上帝知道它的具体时间。以至于所有的猜测，都必须被禁止。然而，猜测从未停息，教会亦从未停止过谴责和严苛的镇压。

在不同人类共同体所使用的时间和历法的巨大差异中，找到自己方向的第一个动作，是建立同步性：这样的战斗与另一个战斗同时进行，这样的君主与另一个君主同时存在，不一而足。这就是第一批希腊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的任务。故此，通过最终敲定的奥运会胜利者名单，他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时间测量工具，每个城市都可以将自己插入其中。即泛希腊的（Panhellenic,），它是无人之人（nobody）的财产。基督徒们不得不做出更多。对他们来说，问题不仅是同步性（synchronisms），而且还是同时性（synchronization）。对他们来说，基督占据了所有时代的，伟大的同步装置（synchronizer）的位置：过去和未来。因为伴随着道成肉身，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启了，它的使命是告知其他的所有人，无论他们身处何方，无论他们是谁。这一时日必须持续到最后的大审判，这一天将在启示录的痛苦之后降临。这就是为世界历史所设的两个极限。

在第二和第十世纪之间，这一新的时代，逐渐征服了罗马西部、继承了它的王国和欧洲区域，然后自十六世纪伊始，它开始对世界其它地区进行殖民统治。通过带来基督，传教士，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他们确实是圣徒克里斯托弗（Christophores），但他们也是柯洛诺斯（时间）圣徒（Chronophores）：他们带来了真正的时间，就在其真理之中。借助基督教的时间，人们确然必须去理解一个日常的纪律，由祈祷和礼拜来点缀，以及一个历法（首先是礼拜仪式），但也有一个普遍的年表和历史神学。转变世界，就是为终焉之时而工作。

在这个简短的西方时间系谱中，我们必须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留出空间：即14世纪的机械钟。想要精确地知道时间是不自然的。但事实却是在 15 世纪，城市和修道院都配备了时钟。在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看来，时间测量的进步，构成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这是从“教会时间”到“商人时间”的过渡吗，正如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所设想的那样？未必，因为教会并没有拒绝将这段时间分割开来，并由打钟人来日夜计算。例如在中国，机械钟引发了一些好奇心，尽管利玛窦（Matteo Ricci）在（17 世纪）做出了努力，但这仍旧被当作是一种“繁复的怪现象”。“他们的钟表不如我们的水钟”，17世纪的一本中国小册子如是言道。由于“如此难以制造，又如此容易出错，它们难道不是一种浪费吗？”在当时，小时甚至是分钟对工作组织来说，都不甚重要。

剩下的故事，是关于柯洛诺斯如何一点一点地从它的两个监护人时机和危机那里逃离，获得了自主权，并随着现代时间的推移，将其帝国扩展到西方世界和其它区域。我在这里只保留了两个特征。如果“柯洛诺斯”逃脱了，“时机”和“危机”也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转变了，可以这么说——在柯洛诺斯的控制和服务下。事实上，现代人用它们来思考时间上的断裂，自革命肇始，他们对危机（crisis）进行了整体性的分析，这仍然与今天息息相关。此外在十八世纪末，现代时间明确离开了圣经年代学的桎梏。传统的六千年不再立得住脚：地球的过去必须以百万年来计算，无限的进步前景则在未来面前开辟。这种对时间的延长，只能削弱道成肉身和大审判这两座里程碑，尽管它们的神学意义保留了下去，但它们在长期支配的柯洛诺斯时间之中失去了位置。但对所有那些有点“被启蒙”的人来说，他们离开了历史，进入了寓言之中。自那时起，现代的历史性制度便可以腾飞了。在 1793 年的法国，革命者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时间和新的历法，即纯粹的共和主义。正如我们所知，这是一次失败。历法抵抗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是关于时间的激烈辩论的数十年。柯洛诺斯试图扩大他的帝国。故而，在 1884 年，华盛顿特区会议，导向了将格林威治子午线作为建立世界通用时间（GMT）的参考子午线，和将全球划分为二十四个时区的决定。在这次准备已久的行动中，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这一切进展缓慢并引发了抗拒。孤立无援的法国人，最终只能放弃“他们的”巴黎子午线。格林威治子午线成为了“同步装置”。从那时起，每个国家都可以建立自己的时间：每个人有自己的时间，所有人都有共同的时间（标准）。理论上而言，任何子午线都可以作为参考，但它恰好选择了格林威治子午线，这个子午线穿过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帝国权力的心脏。换言之，这种普遍的平均时间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西方的甚至是英美的时间，即使它是以“有用”和“现代”的名义进行推进的。

在这几年中，人们在改革历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欧洲、美国，和其它地方出现了许多项目。在 20 世纪 20 年代，年轻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着手处理这一主题。他们希望实现历法的标准化，而形式就将是“世界历法”。它将伴随并便利贸易和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世界和平的工具。在西方世界之外，一部分精英也赞许这样的演进。圣雄甘地便支持这项改革，就像他希望“所有国家都有统一的货币制度（coinage），并为所有民族提供一种补充的语言——例如世界语”一样。但是在最后，改革并没有进行，不像对时间那样。为何没有呢？因为对于历法来说，我们不仅是在，或者说不主要是在时间中，而是在时间中和宗教中的混合。事实上，我们看到过宗教当局站出来反对它：梵蒂冈甚至拒绝讨论它。三个圣书的宗教，组成了一个共同阵线。周五、周六和周日将成为“游离的”（nomadic）日子。面对这种反对，不同的政府放弃了。希特勒上台后，战争已近在咫尺：不再有关于战争的讨论。而资本主义，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它能够适应（这一切）。

尽管柯洛诺斯是一个帝国，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进程中，它并没有逃脱危机和或多或少的强烈质疑：在一些场合，未来摇曳不定，但它并没有沉沦，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设法恢复了自己，至少在未来失去其驱动力，并被证明是威胁的递送者之前；而现在论这一名词，则为时间的新的经历赋予了一个名字（暂时）。